

**THE MOTIF OF CLAN MEMORY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AL ORIGINS: A TYPOLOGICAL DIALOGUE BETWEEN
CH. AITMATOV AND CHI ZIJIAN**

Lu Dongliang

PhD researcher (doctoral stud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Uzbekistan named after Mirzo Ulugbek

e-mail: 18346341385@163.com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Soviet rural literature, Kyrgyz writer Chinghiz Aitmatov takes his native village Sheker as his spiritual origin. Adopting artistic conventional devices such as myths and symbols, he depicts national memory, ecological ethics and universal human moral ideals. Chi Zijian, a core writer of Chinese root-seeking literatur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Aitmatov's works. Taking Arctic Village,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and the Ewenki ethnic civilization as writing carriers, she traces local cultural origins through folk legends and primitive natural scenes. The two writers form a cross-national and cross-civilizational typological literary resonance: both regard their hometowns as spiritual coordinates and reflect on ecological crises through poetic rural depictions; both employ mythic narratives to carry collective clan memory and criticize the modern dilemma of abandoning traditions and severing cultural roots; both center on grassroots laborers and adhere to the core creative tenet of moral idealism. By comparing their textual motifs, artistic techniques and value stan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hared spiritual pursuits of cross-cultural rural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n rural and root-seeking literatur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Keywords: Aitmatov; Chi Zijian; Root-seeking Literature; Clan Memory; Mythic Narrative; Moral Idealism

一、引言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 20 世纪苏联极具世界影响力的乡土文学巨匠，其作品扎根吉尔吉斯草原村落，融合现实主义与神话幻想，在民族叙事中叩问全人类的生存、道德与自然命题。20 世纪 60 年代初，《查米莉亚》译介进入中国，此后国内陆续诞生《艾特玛托夫在中国》《艾特玛托夫

与中国当代文学》等研究专著，系统梳理其译介脉络与文学影响。迟子建多次公开推崇艾特玛托夫，称其文字纯粹通透、兼具悲悯力量，视其为精神与创作上的重要引路人，二者在乡土书写、文化寻根、神话运用、劳动者塑造层面形成高度契合的文学对话。

苏联乡村文学与中国 80 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诞生语境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依托苏维埃乡村社会变革展开叙事，后者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核心命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平衡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艾特玛托夫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寻根作家群体中广泛传播，关键在于其文本兼具鲜明民族审美与现代性反思，为中国作家的文化溯源实践提供了成熟创作范本。本文从故土书写、神话叙事、劳动者形象、道德理想四个维度，对比两位作家的创作共性与内在精神联结。

二、故土作为精神原点：乡土风景书写与生态反思

2.1 故乡：作家的文学原乡

艾特玛托夫明确提出，每一位作家都必须拥有扎根土地的精神坐标，吉尔吉斯谢克尔村庄是其全部创作的源泉。村落民众的生活、苦难、命运滋养其文学天赋，本土乡村的现实困境超越地域局限，具备普世人类意义，成为其永不枯竭的创作素材库。谢克尔的草原风物、民间信仰、普通百姓，构成他追溯民族文化根脉的核心书写对象。

迟子建以北极村为文学原型，与谢克尔村庄形成互文关系。她坦言自身全部文学思考皆绑定故乡、童年与东北自然；少时以为世界等同于北极村，成年走遍四方后才发觉，世间万物的内核都藏于小小的乡土。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致辞中，迟子建直言故土山林江河赋予文字生命力，她与艾特玛托夫秉持同一文学信念：伟大作家首先归属于本民族，对故土体察越深，文学世界便越厚重辽阔，故乡是观察人类社会的窗口。

2.2 诗意乡土图景与生态批判

两位作家的风景描写兼具抒情性与象征性，同时暗含对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刻忧虑，共同批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唤醒读者的生态良知与道德自觉。艾特玛托夫在《永别了，古利萨雷！》中铺展草原赛马图景，骏马古利萨雷如燃烧的灵魂驰骋旷野；《查米莉亚》勾勒八月草原星夜，晚风裹挟苹果、玉米与干草的气息，男女主人公的歌谣飘荡在无垠原野，字里行间满是对吉尔吉斯故土的眷恋。《骆驼眼》以水面星光、驮着月色的羚羊构建空灵自然意象，借助细腻景物修辞搭建沉浸式乡土空间。

迟子建《原始风景》以极具浪漫想象的笔法书写大兴安岭冰雪月色：主人公背负桦皮篓收集冰上月光，将月色当作柴火点燃，写出苦寒土地独有的温柔诗意。大兴安岭的风雪、冰河、森林、北极村炊烟共同构筑她的精神原乡，提出“寒冷亦是一种温暖”的生命哲思，与艾特玛托夫草原书写形成跨国度的诗意呼应。

二者借乡土自然书写揭示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在矛盾，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升至道德层面，为后续神话叙事、传统反思埋下伏笔。

三、神话叙事：宗族集体记忆的文学载体

神话、传说、民间寓言是两位作家共用的核心艺术手段，从技法层面属于艺术假定性，从思想层面是留存宗族记忆、追溯文化根脉的媒介，二者神话书写的核心母题均为追寻人类共通道德理想。

3.1 神话的教化价值：自然伦理与民族记忆

艾特玛托夫将神话、传说定义为民族道德教科书，认为神话是族群浓缩的集体生命经验、历史哲学，是留给后代的精神箴言。人类通过神话认知自然，确立自身作为自然一份子的身份；评判人性善恶的根本标准，便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神话承载规范道德、提升审美、丰盈精神世界的功能，敬畏自然是人一切良知的根基。

对艾特玛托夫而言，援引神话是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创作路径。古老传说能够帮助现代人重新理解先祖，多层次、多维度拓展文学表达，让远古文明适配当代精神语境。迟子建同样高度肯定神话的文学价值，她提出神话渗透人类生存全部领域，与文学想象力深度绑定，是跨越时空的璀璨文学光晕；想象力是神话诞生的前提，神话与艺术天然共生。她依托神话叙事引导读者重审人与自然、文明与传统的关系，确立民族历史的精神价值。

3.2 神话意象与忘祖批判：“故土神灵”与曼库尔特

艾特玛托夫创造“故土神灵”系列神话意象：《花狗崖》鱼人、《白轮船》母鹿图腾、《一日长于百年》白色母驼阿克玛亚，均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腾先祖。与之相对，“曼库尔特”是遗忘先祖、割裂宗族记忆的反面符号，萨比特便是现代曼库尔特典型。小说中政府计划铲平奈曼阿娜古墓修建航天发射场，象征现代化进程中民族集体记忆被人为斩断。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雾月牛栏》《东窗》中大量运用少数民族神话。《东窗》依托沿海少数民族民居传说，以东窗作为人神沟通的象征，隐喻传统、历史与精神信仰。主人公李满囤世代传递东窗传说，即便自

身离世，民间记忆依旧延续。迟子建借传说点明核心观点：遗忘过往的人终将活在恐惧之中，该论断与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序言形成共鸣——失去民族历史记忆的人，将脱离历史视野，困于浅薄的当下。

3.3 民间歌谣：苦难之中的精神记忆载体

两位作家设置情节高度相似的民间歌谣收集者形象，以人物悲剧隐喻传统记忆的消亡。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陈绍纯一生奔走乡间搜集民歌，文革时期因传唱民间歌谣遭受批斗，毕生整理的歌本尽数被毁，唯有曲调留存心底，歌谣成为支撑他熬过苦难的精神支柱。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阿布塔利普同样痴迷民间传说与歌谣，坚信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民族历史，他整理的歌谣集被判定为反动材料，最终冤死狱中。

二人共同认为，民间歌谣承载宗族记忆，能够给予人希望与力量；两位搜集者的悲剧，象征现代社会对本土精神信仰的抛弃，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理想崩塌。同时，文本中民间哀歌具备烘托悲剧、抒发内心痛苦的叙事功能：《永别了，古利萨雷！》的《母驼哀歌》、《老猎人之歌》与《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萨满神歌，均借助民间歌谣完成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刻画。

四、底层劳动者形象：道德理想主义的具象承载

道德理想主义是艾特玛托夫与迟子建统一的创作精神内核，底层乡土劳动者是二者道德理想的载体，作家通过描摹劳动者生存境遇、精神品格，完成对人性本善、劳动价值的礼赞。

4.1 劳动的精神内涵

艾特玛托夫将劳动视作超越谋生的生命使命、面向世人的永恒责任，他始终关注乡村劳动者的命运，认为乡村题材完整记录时代变革。他不将劳动者窄化为务农放牧之人，而是看重个体在时代冲突中丰富的精神世界，聚焦时代困境、人性挣扎、善恶博弈中人性的光辉。《一日长于百年》叶迪盖勤勉纯粹，所有勤恳劳作的灵魂天然具备精神共鸣；叶迪盖与卡赞加普、《断头台》博斯顿与埃尔纳扎尔的真挚友谊，印证劳动凝聚人性、塑造高尚品格的力量。

迟子建对劳动的理解兼具生存底色与精神担当：劳动是底层民众生存根基，也是人面向世界的使命。《奇寒》中主人公父亲死于木材流放劳作，迟子建认为这类朴素的死亡自带崇高感，饱含对劳动者温暖、悲悯的敬

重；《一日长于百年》铁路工人卡赞加普殉于岗位，艾特玛托夫对平凡劳动者持有同等崇敬。

4.2 《额尔古纳河右岸》：少数民族劳动者的道德史诗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是集中体现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作，作品聚焦鄂温克少数民族自给自足的文明进程，以民间叙事铺展宏大历史图景。小说刻画鄂温克人对抗自然的生命尊严，书写族群对部落、自然的道德责任，礼赞少数民族坚韧不屈的精神与丰盈内心，完整实践迟子建依托乡土族群构建道德理想的创作追求。

陆人豪评价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质：其立足吉尔吉斯劳动者现实抛出哲学追问，又以本民族独有的生命观给出解答，这也是二者共通的创作逻辑——扎根本土普通人的生存现实，提炼全人类通用的道德价值。艾特玛托夫提出文学永恒的核心是书写人本身，迟子建同样主张优秀文学应当贴近普通人，二者最终将乡土、神话、生态议题全部收束于“人的道德追寻”这一核心命题。

五、结语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与迟子建分属苏联乡村文学与中国寻根文学两大体系，时代、民族、文明背景截然不同，却在宗族记忆与文化根脉探寻层面形成完整的类型学对话。二者共享三重核心创作逻辑：第一，以专属乡土原乡为精神坐标，以诗意自然书写反思现代生态危机；第二，活用神话、民间传说、歌谣等艺术假定性手法，留存宗族集体记忆，批判遗忘传统、割裂民族根脉的现代弊病；第三，以底层劳动者为叙事核心，坚守道德理想主义，在普通人的生存中发掘永恒人性价值。

艾特玛托夫的跨文化传播为中国寻根文学提供了重要创作参照，迟子建在吸收其文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域、少数民族本土文化完成本土化创新。对比二者创作，能够打通中俄乡土文学、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视野，揭示跨文化乡土书写共通的精神诉求：在现代化浪潮中守住民族文化根脉，重建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平衡，追寻永恒的人类道德理想。

参考文献

1. 韩捷进. 二十世纪文学泰斗·艾特玛托夫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21-222.

2.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艾特玛托夫文集·第二卷 [M]. 莫斯科: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3: 196-197.
3.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艾特玛托夫文集·第三卷 [M]. 莫斯科: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4: 427-428.
4. 迟子建. 中篇的长河 [J]. 上海文学, 2016 (10): 106.
5. 迟子建.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190-191.
6. 迟子建.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69,31,38.
7.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279.
8. 李雪. 艾特玛托夫与中国当代文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182.
9. 叶·米·梅列金斯基. 神话诗学 [M]. 莫斯科: 科学出版社, 1976: 295.
10. 陆人豪. 回眸: 俄苏文学论集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58.